



杨振声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(左)、九妹沈岳萌合影。



1948年,北京王府井安福楼内,杨振声(前排中)与沈从文(后排右三)等合影。(杨起提供)

援手,一生挚友

细节以及他们的青岛缘分

3 破格聘任 “蹭课生”,执教国立青大

尽管没有过硬的大学文凭,没有耀眼的留学经历,杨振声依然接受徐志摩的推荐,决定聘任沈从文。“当时青岛大学的讲师薪金分为五级,从一百元到二百四十元不等,应该说待遇是比较优厚的。杨振声显然是想把沈从文引进他所任职的高校任教,从而解决他的生活问题”,王道先生说。

“杨振声先生打造的国立青大,在山大整个校史上,是前无古人的,他不拘一格聘任人才,聘任沈从文时是有人反对的,但他并不在意外界的眼光,他慧眼识英雄,给予他们广阔的平台”,山东师范大学李宗刚教授说。当时鲁迅就曾致函章廷谦:“青岛大学已开。文科主任杨振声,此君近来似已联络周启明之流矣。此后各派分合,当颇改观。语丝派当消灭也。陈源亦已往青岛大学,还有赵景深、沈从文、易家钺之流云。”

1931年9月,享誉南北大都市的著名小说家沈从文,第三次登上了大学的讲台,相较于第一次上台时说不出话来的尴尬场面,沈从文从容自信了许多。面对慕名而来的学生们,他应对自如,侃侃而谈,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满腹经纶,使得课程非常生动。

环境舒适,心情舒畅,文思泉涌,生活无忧,结束了此前的漂泊,在青岛时的沈从文一扫阴霾,变得热情饱满。除了讲课,他还会给朋友写信汇报近况,创作出许多小说、散文。

众所周知,在国立青大,有一个著名的“组织”:酒中八仙。由杨振声带领的闻一多、梁实秋、邓仲纯、刘康甫、赵太侔、陈季超、方令孺,组成固定酒局成员,“三日一小饮,五日一大宴,豁拳行令,三十斤花雕一坛,一夕而罄”(梁实秋语)。这“八仙”有时也结伴出游,近则济南,远则南京、北京,出言“酒压胶济一带,拳打南北二京”,豪气干云的样子。酒酣之余,杨振声带着他们一起在海边散步、到崂山观光,或是去海滨公园观赏海棠、樱花,应该说这一时期也是杨振声最为惬意的

时期。

然而,在这群身影中,没有沈从文。“聚会中,常常少了为生活和情感问题所烦扰的沈从文。在这些教师中,有不少也是沈从文的至交好友,有时茶聚或外出郊游时,沈从文也会相从前往。有段时间,方令孺在青岛与人闹了一点不愉快要回北平时,沈从文还致信徐志摩,希望他能伸出援手给方令孺找一份工作”,王道先生说。

也就是说,沈从文虽然没有参加酒局,但并不像传言那样,不入流不合群,而是忙于备课创作,照顾九妹沈岳萌,追求爱人张兆和,无暇他顾。

在青岛,杨振声的校长生涯并不是很顺利,虽然他一直在竭力招揽人才,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,但在校两年,由于时局动荡,学校里发生过三次学潮,作为校长,他需要劝阻,但他又非常理解学生,因此陷入了两难境地。据在校学生徐植婉回忆,当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,“杨校长神情肃穆地走上讲台,以非常沉痛的声音向大家宣布了事变消息”,学生们义愤填膺,成立了“反日救国会”,“领导小组由杨校长、沈从文老师、两位男同学和我组成”。此举引起了当局不满。

由此可知,沈从文曾协助杨振声处理学潮这一棘手事务。遗憾的是,这一事件最终无法收拾,杨振声最后的结局就是辞职。在上一次因为假文凭事件引发学潮时,梁实秋曾说过:“今甫是彬彬君子,不善勾心斗角,对于任何人皆无疾言厉色,事变之来如疾风暴雨,其衷心苦闷可以想见。”

辞呈递交上去,被驳回,再递交,如此反复,1932年9月2日,杨振声的辞职案正式通过。时教育部宣布“解散”国立青岛大学,改组国立山东大学,赵太侔任校长。

而杨振声去职之后,并没有离开教育界,而是进入了教育部“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”。这一职务又让杨振声想到了沈从文。

4 患难真情 预支薪水,帮忙赎回戒指

杨振声匆匆离开青岛,沈从文心情复杂。当杨振声催他北上的信件一封又一封抵达,甚至亲自回青岛邀请他时,沈从文还是没有立刻下定决心。他想追随好友,但身不由己。“其实沈从文之所以滞留在青岛,是因为此时张兆和已经来到青岛与爱人相伴。受生活现实所迫,他们不敢‘轻举妄动’”,王道先生说。

尽管没有立刻与杨振声并肩战斗,沈从文仍是杨振声的支持者,1932年冬,沈从文和杨振声在北平与政界、文教界的于右任、蔡元培、梁实秋、闻一多等人参加了纪念清末起义军烈士唐才常的小型聚会。当时杨振声题写的诗正是在青岛时所作的怀北平诗:

别后伤时节,登高望旧京。
山空秋色满,海阔暮云平。
霞照千家火,风吹黄叶声。
归途踏明月,楼影数枝横。

刚刚辞去校长之职,杨振声心境复杂,在侧的沈从文感同身受。此后的聚会,两人相影相随。

为了招沈从文北上,参与编写中小学教科书,杨振声还致信胡适帮忙催促:“从文为青大留下,那次你寄来的《女声》,我已转寄给他了。但因他不来,我自己的工作就不免很忙,还是盼望他在一个时期能来,工作太多了——教科书、课外读物、实验与教授法——又想参考的广一点,一人是决计忙不下来。”直到1933年的暑假,沈从文才正式辞去青岛的教职,到北平参与杨振声主持的教科书编写工作。

“到达北平后,沈从文没有住处,最早是借住在杨振声家里,当时随行的还有张兆和、张充和”,王道先生称,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曾记录下这样一件事:“一天,杨家大司务送沈二哥裤子去洗,发现口袋里一张当票,即刻交给杨先生。原来当的是三姐一个纪念性的戒指。杨先生于是预支了50元薪水给沈二哥。后来杨告诉我这件事,并说:‘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,哪有还没结婚,就当小姐的戒指之理!’”杨振声为人热情而慷慨,对朋友常常会伸出援手,对于这一点相信沈从文也是记在心间的。

此后,两人几乎形影不离,编教材的同时,还合作编辑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,同住颐和园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跟随北大、清华的教师撤离北平,沈从文与杨振声一路上颠沛流离,互相照顾,谱写了一段段“真情旋律”。从武汉,到云南,文人之间的患难之情,更是难能可贵。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先生在晚年曾回忆起杨振声,说:“爸爸的朋友中,我对杨振声的印象非常深。父亲叫他杨先生,我和弟弟叫他杨公公。他比父亲大,等于是长我两辈。”

1937年抗战爆发后,北大、清华和南开大学南迁,组成西南联合大学。杨振声担任联大常委、秘书主任。在一次教师节聚餐会上,杨

振声向文学系主任朱自清建议:“可以让沈从文到联大师范学院教书。”尽管沈从文没有文凭让朱自清很为难,最终沈从文还是谋得了一席教职。

1946年6月7日,沈从文被续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。杨振声先他一步飞回北平,作为少数先遣人员回去接管北京大学和整修校舍,两家的住处都在中老胡同的大院里,他们的友谊,注定要继续下去。

或许因为奔波劳累,杨振声这位魁梧的山东大汉突然病倒了,1947年3月底,做了胃切除手术,胃被割去了一半。1947年5月6日的《大公报》报道了战后教育经费之紧张和教授生活之困难:“教授沈从文咯血。杨振声胃病,危险已过,身体尚未复原……”

“为了更好地调养身体,杨振声在好友何思源的劝说下去了颐和园休养。何思源早期曾在山东担任教育厅厅长,负责筹办国立青岛大学,杨振声则是青岛大学校长。此时,何任北平市长,颐和园霁清轩被分给他私人居住,但他主动让了出来,让喜欢安静的杨振声入住休养”,王道先生说,霁清轩时光成为杨振声和沈从文继青岛之后的另一个休闲时光。

从杨振声致子女的信中可知,他本来是想来青岛静养的:“我本来去青岛的意思相当强,后来又想到弟弟不能去……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了颐和园……也许沈先生、三小姐来住个暑假。这房子可不坏,在谐趣园后面一个小山坡上,另一个院子,前门与谐趣园相通。关上前门走角门,就另成一个园子,里面也有小河流、住宅、走廊、亭台、山石等等。讲幽静是颐和园第一,里面有几处房子,都分得开,我自然住了最好的,其余给弟弟留一处,沈家一处”。

杨振声带着儿子在昔日的皇家园林里享受着难得的宁静,陆续前来加入颐和园的还有张充和、傅汉思。霁清轩里还常有客人间隔来往。林徽因、梁思成、诸有琼、张友仁等曾前来探友和游园,为这个稍显落寞的园子增添些许热闹和温馨。

然而,这是他们最后的幸福时光。之后,沈从文因遭到批判两度想放弃生命,走出阴影后主动要求下乡去,去四川参加土改。杨振声则被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。一南一北,却心系对方。

1956年3月7日,杨振声在北京去世,追悼会在金鱼胡同贤良寺举行,沈从文前去参加。1980年,美国学者金介甫来到中国对沈从文进行系统访问,在多次交谈中,沈从文念念不忘对中国教育贡献极大、对自己帮助极多的杨振声:“杨振声是代表北大在西南联大。他最大的贡献是把清华大学改造。他当文学院院长时,将白话文引到学校,在青岛大学当校长时,做教职员的可以听课,听八个小时的课,很有眼光。”